

*Sala's Gift :
My Mother's Holocaust Story*



莎拉的礼物

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

(美) 安·科什那 (Ann Kirschner) / 著

杨晋 / 译

*Sala's Gift :
My Mother's Holocaust Story*

莎拉的礼物

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

(美) 安·科什那 (Ann Kirschner) / 著
杨晋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美)科什那著;杨晋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

ISBN 978-7-80225-617-0

I. 莎… II. ①科…②杨…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8083 号

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

(美)安·科什那/著 杨晋/译

责任编辑:许彬

装帧设计:王梓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9.5

字数:232 千字

版次:2009 年 2 月第一版 200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书号:ISBN 978-7-80225-617-0

定价:34.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沙拉的欧洲

1939—1945



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吗？

因为只要你在阅读，我们就在一起。

瑞泽尔·冈卡兹

1941年4月24日

我有我们亲爱的父母的相片，还有我收到的家里寄来的、从我出发去集中营的第一分钟开始算起的所有邮件。这些年来，我一直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看着它们，守护着它们，因为它们是我最大的财富。

莎拉·冈卡兹

1945年10月10日

目 录

引言 在她成为我母亲之前	001
第一章 顶替姐姐	011
第二章 一个干净的犹太人	029
第三章 萨仁卡	057
第四章 小的和灰的，老的和小的，穷的和富的	097
空位期 1942 年 8 月 12 日	135
第五章 好日子 好邮件	139
第六章 最后的生日	171
第七章 120 年自由	197
后记 沉默的另一端	241
莎拉经历的劳动营	263
莎拉的家庭	265
资料注释	267
鸣谢	279
译后记	281

引言

在她成为我母亲之前

我母亲有个秘密。

我知道莎拉·冈卡兹出生在波兰，是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而且她是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我有一个姨妈还活着，但我们曾经庞大的家庭里其他人的情况，甚至包括他们的名字我却都一无所知。

在我母亲少有的几次回顾过去的时候，她会告诉我们她是作为一个英俊的美国士兵的新娘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的。我喜欢听她的故事，尤其是因为我的哥哥们和我在故事里是主角。可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对这个故事也不尽信。我母亲用一个完美的结局替代了一个未讲述的故事。从幸存者莎拉到幸福的美国家庭主妇和母亲莎拉，如此迅速、如此完全的转变看上去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她在 1939 年被外星人掳去，然后 1946 年在纽约安了家。

过去的莎拉去过什么地方？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手臂上为什么没有被刺上一个号码呢？

我无人可问。我从未跟我的哥哥们或我的父亲谈过这个话题。在这些问题提出之前，母亲的沉默似乎就能够把它们全部吞没。如果有人——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或一个不小心的亲戚——偶尔误入了这个禁区，问起了莎拉在战争期间的事情，她会把脸转过去，好像她刚刚

被人扇了一记耳光。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拒绝谈往事，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很愿意倾听。我有些朋友，他们的父母能够不停地说过去的事情。够多了，我的朋友会说，我们已厌倦了扮演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①。

我仔细看过她梳妆台上的旧照片，它们是黑白的，静静地像哨兵一样站在那儿。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张年轻莎拉的漂亮的侧面像，她正凝视着一个年纪更大点的女子：“我的朋友艾拉·格特纳。”我的母亲告诉我，可是她没有告诉我细节。她们在哪儿认识的？后来艾拉·格特纳怎么样了？莎拉浓密而富有光泽的头发如瀑布般垂在背上，高高的颧骨折射着光芒，就像我最喜欢的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莫伊拉·希勒（Moir Shearer）和艾琳·邓恩（Irene Dunne）演的老电影里让人无法不着迷的天真少女一样。艾拉与之相比就没那么漂亮了，但是她的帽子翘起的样子却颇有些大胆和老成，而且她与我母亲交织的眼神非常迷人。

当然了，尽管莎拉尽了最大努力，她却无法在我们的现在和她的过去之间建起一座无法穿透的墙，一层雾不知不觉地渗入了进来。1961年在电视播放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时，她坐在电视机前，接连看了好几个小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她读了所有有关大屠杀的书，看了所有有关大屠杀的电影，每年大屠杀的纪念日她都会纪念，只不过默默地，私底下地，好像我不在旁边看着一样。

我以为等我也做了母亲她也许会让步。我决定了，等我的孩子大到会提问题时，我们就试试。后来我的女儿准备一个有关家庭历史的学校作业时，想采访她的外祖父母。当时的场景非常理想：我们很舒

① 玛莉莎·穆勒的畅销作品《安妮的日记》的主人公，为荷兰犹太少女。——译者注

服地在我爸妈的客厅里坐着，碗洗好了也放好了，沙发的靠垫也弄平整了，玩具也收拾好放在柜子里。我的父亲非常合作，他对三十年代纽约的回忆形象生动，令人遐想。轮到莎拉时，她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扭来扭去找不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她讲了几件无关紧要的轶事，比如她唯一的绒布娃娃玩具，她的朋友圈，以及她们的学校制服等。这些我都听过。但是那时候她的不适开始剧烈起来；一直困扰她的关节炎和腰疼打断了她，她只得站起来，四处走走，这样她暂时的、慌乱的回忆停了下来。她守住了她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在 1991 年的一天结束了。那天将永远改变我眼中的她，同时也将永远改变我的生活。

莎拉正要住进医院，她前一个周末是在我家度过的。她在以色列旅行时新的症状变得严重起来。突然之间耶路撒冷的山变得太陡了，她爬不动了。回到纽约后她得知她需要进行三重心脏搭桥手术。

她时年六十七岁，戒烟后的第一个星期她十分痛苦，而且她的手因为没有往常的香烟，看起来空空的。我看得出来她准备说再见了。那是一个优美的夏日，我们刚刚吃好午饭，我正一人独坐着。她走出来，坐在我身旁。我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纸板盒子，这盒子以前是装我旧时玩过的快速拼字游戏的。

她把盒子端给我，说：“这应该是你的。”

她的珠宝，我想。

不是的。我在盒子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很旧的褐色皮制文件夹，如一本平装本书大小。里面是数百封信、明信片 and 纸片，一些字写得小而挤，很难辨认，一些则是漂亮的斜体字，还有一些是用钝头铅笔在不规则的纸片上匆匆写就，所有的这些都细心地收好了。“这些是我在集中营的信。”她说，并把它们在我面前摊开。明信片和信还有照片铺满了桌子，旧纸张的味道升腾起来，弥漫在夏天的空气中。

“你想知道什么？”我的母亲问道。

于是我开始问了。

问题一个个胡乱地冒了出来。她去过什么地方？谁写的这些信？她怎么保存下来的？这些人现在在哪？我的母亲尽她所能地回答我，她的声音里是久未提起的人名和地名。

很快她就累了。我们一起把这些信件放回到保存它们如此之久的盒子里——不过现在这个盒子是我的了。

我母亲的信不仅仅填充了她过去的地图的一个空白，它们还带来了鲜活的她——还是个少女的我的母亲——它们同时把我们的亲人们从阴影中带了出来，在战争中逝去的外祖父母、姨妈们、舅舅们和表亲们。

这些信件是由八十多个不同的人所写。它们讲述了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以及一个由政府精心组织、企业支持的奴隶体制的故事。只有最初的几张明信片是用波兰语写的；其余的通信都是用德语写的，只有极少的捷克语和依地语。有些标记看来十分明显，如“Z”形的签章，表明曾被检查员审阅（德语的审阅是 *zensiert*）过，但其他的则需要认真研究才知道它们后面的秘密。其中有几十封漂亮的手绘生日卡，有些上面写着诗和奇特的花以及儿童的图案。我委托他人把它们译成英文。我非常没有耐心；每件译稿的到来都让我十分激动，好像这些信件是昨天才写的，而且是写给我的。我发现了艾拉·格特纳的信，她的笔迹醒目独特，一如她的照片。还有几封偷偷带进集中营的情书，是由一个叫哈利的追求者写的，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我仍住在布鲁克林的罗斯姨妈，也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了。而我母亲梳妆台上褪色的照片，现在也焕发出盎然生机。

我母亲和我一起读着这些信。她几乎和我一样需要看英文版本；战争结束后，她能流利地说和书写德语，而且除了自己的两门母语波

兰语和依地语外，还略知一点俄语和捷克语。但在1946年她就不说这些语言了。她的波兰语和德语能力已经退化到阅读都有很大困难了，况且她生硬的翻译还受到情绪的阻碍。听着她熟悉的声音发着那些奇怪的音节，我感觉就像是有人施了古怪的魔法，假冒了我的母亲。

我们不停地聊着。她容忍了我的问题和我的录音机，告诉我一件又一件事情，仿佛分享她的记忆的限制从未存在过一样。她是第一次讲这些故事，而我则是个饥渴的倾听者。

在我想象中，母亲作为囚犯在一个纳粹集中营里经历了相对较短的苦难，可结果却是几乎长达五年的、在七个不同的劳动营的奴役（在此书附录里有莎拉的七个集中营的完全列表）。她是来自波兰西部约五万奴隶——年轻健康的犹太男女——中的一员。他们是施梅尔特组织（Organization Schmelt）手中的珍贵财产，这个组织是纳粹入侵波兰后不久成立的，为纳粹党卫军^①的分支。

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劳动营，往往隶属于德国企业拥有的建筑项目或工厂，条件不一而足，不过在莎拉的集中营里，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与奥斯维辛的囚犯不一样的是，这些人身上没有被刺上号码。这些犹太人是要留着性命的，至少要完成当日的工作。他们被迫与自己所爱的人分离，他们挨着饿，在无法想象的条件下进行超长时间的劳作，他们睡在人满为患、缺乏供热和换气设备的木头房子里，而且他们时刻活在恐惧中——但是纳粹却为他们传送邮件。信件和包裹都是允许的，甚至是提倡的，好像他们不是囚犯，而是第一次离开家去野营的人，而纳粹们也愿意告诉那些焦虑的父母们一切都好。不过到了1943年夏天，所有的普通邮件全停了。

施梅尔特组织在历史上是个并不重要的脚注。相对而言，关于纳粹官僚和犹太领导人以及德国企业的合作关系较少见诸文字。正是这

① 纳粹党卫军又称为SS，即 Schutzstaffel。——译者注

种关系把成千上万的人从波兰上西里西亚东部（Eastern Upper Silesian）地区诱拐而来。甚至很少有书提过阿尔布莱切特·施梅尔特（Albrecht Schmelt）的名字，他是该组织的总建筑师，这个迅速扩张的奴隶贸易让他发家致富，也藉他而得名。能接受邮件的犹太人劳动营的存在几乎无人知晓，它们的具体方位也几乎被遗忘——除了那些曾在那儿被囚禁过的人们。

这也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倘若要描写这些筑建在地狱外沿而不是地狱中心的地方，可能会影响世人对奥斯维辛伤痛之地的了解。在施梅尔特的集中营里，没有毒气室，没有焚尸场，也没有人数众多、形同鬼魅的玛索尔人（Musselmen），他们是奥斯维辛常见的行尸走肉，在奥斯维辛，人平均的存活时间是三个月。

因为死亡集中营的条件要恶劣许多，有时甚至在幸存者之间不经意地会有一种攀比意识。“噢，你的母亲在劳动营啊。”一个幸存者告诉我，不以为然地挥挥她的胳膊，正好足以让我看见她前臂上刺的数字。我当时在给她看母亲的一些信。“我在奥斯维辛，”她大声说道，“在奥斯维辛我们绝无可能有那样的信件。”她在匈牙利的家里一直待到1944年，她大部分的家人都幸存了下来。我问她在奥斯维辛待了多久。“四天。”她淡淡地说。

在奥斯维辛待了四天……在七个不同的劳动营待了五年。我的母亲失去了她的父母、姐姐、哥哥、外甥和外甥女、表亲：她失去了大家庭中至少四十个成员。我不想比较。有些苦难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

我更欣赏谈到这个话题时莎拉和她的朋友们发出的沙哑的笑声。“我父亲很有钱的，他把我送到营里住了两年！”喝咖啡时古希亚吹嘘说，笑着敲着桌子。“哈！”莎拉嘲笑地哼了一声，“我的父亲比你父亲有钱多了——他把我送到营里住了整整五年！”

莎拉的勇气和胆量堪比一个档案保管员的本能。五年以来，冒着

遭受严厉惩罚的危险，她把所有的信件都藏好，不让集中营的守卫发现。通过创建一份自己苦难的纪实写录，她同时也是在延续着一个亘古即有的为群体灾难做编年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可追溯至古老的《圣经》。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区和集中营里，人们书写着，保留着第一手的见证和其他文件。人们举行比赛鼓励个人编年史和日记的撰写。“兄弟们，写下你的一切所见所闻吧，”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 Dubnow）在离开里加（Riga）的犹太人区时这样呼吁。“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在埋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牛奶罐里，在扔在奥斯维辛悲惨的土地上的容器里，档案被细心地藏了起来。与战后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原始材料不会受到捉摸不定的记忆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的创建者已然逝世，而它们却依然留在世间。

莎拉的信件就是点滴的时间，是自发的倾吐，带着走形的真实生活，它们的情感是真切的，未加过滤的。它们从未触及世界大事。由于不联系背景就无法阅读，我在讲述我妈妈的故事时加了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德军的前进和美国的参战，意大利的勾结和背叛，争夺太平洋的战役——从未有通讯记者提到过这些，他们也不见得对这些故事有多知晓。他们只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有限的观察力。这是一个充满了隐晦的谣言和不确定的祈祷的世界。这些私人信件编织的是一个战争的情感史，一个交杂着恐惧、寂寞和绝望的复杂的赋格曲，总是会回到明天的希望的主旋律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吗？因为只要你在阅读，我们就在一起。”她的姐姐瑞泽尔·冈卡兹如此写道。一纸书信，承载的却是鲜活的亲情。一旦莎拉得到了这些信，她就必须留着它们，因为给莎拉信的就是她所爱的人，就是爱她的朋友和家人。所以她在列队时把信藏起来，把它们交给信任的朋友，把它们扔到房子底下，甚至把它们埋在地里。保留这些书写的文字——这一点就足以让她轻易地丧命——

与挽救她自己的生命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开的联系。我开始理解她的逻辑了：她为保留信件所冒的险与她失去信件后面临的终极危险是无法相比的，因为那样的话，她将会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我从许多幸存者那里听说过关于家里来信的辛酸的故事。我母亲的朋友萨腊在解放后染上了严重的伤寒，于是把她的信件委托给了一个几乎不相识的人，此人许诺在她住院期间会妥善保管信件。医生们告诉萨腊，她在谵语状态时曾不停地跳起来狂乱地在床底下找她的信。当她身体复原后，那个人却已不知所踪，她的信自然也就不见了。丹柯，一个七十好几的女士，在告诉我解放后她的旧箱子被俄军士兵偷走时，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女孩，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因为她的旧箱子里装的是她的父母写给她的信，以及她在战争期间写下的诗句。“他们以为里面有什么呀？”她伤心地哭着。珠希在一次恐怖的集中营检查时失去了她的信件，当她看见1944年写给我母亲的生日卡上自己的字迹时，她简直不敢相信：“你母亲是怎么做到的？”她惊异地问，“你怎么会有这些的？看看，你母亲是多么聪明，多么勇敢！”

在初次发现母亲的信件十年后，我们有过一次热烈的家庭辩论，有关我们是自己留着这些原始的信件，还是把它们托付给图书馆。为了表明他的看法，我的父亲说他也有一箱子信：他在战时与他的朋友及家人的通信。“它可比芭比（Bubbe）^①的要大。”他自豪地说。

这个箱子确实更大。里面有我父亲写给他的兄弟姐妹的热情洋溢、充满乐观的报告，也有写给他军队里的好友的信，甚至还有他打给我奶奶的调皮的电报，讲的是他的婚礼计划。正当我着手给这些新来的文件分类时，我发现了另外五十六封信，是在战争期间写给我母亲的。其中十二封来自艾拉·格特纳。

① 作者的昵称。——译者注

同时还有一份真真正正的宝物：我母亲从1949年10月开始记的日记。在这之前，我对年轻的她的认识仅仅来自于她的朋友和家人的信件，以及她的回忆。但是现在莎拉来到了舞台的中间，记录着她五年历程头几个星期的点滴。我看见了十六岁的她，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盯着眼前陌生的场景，估量着自己的将来，心里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可是无法明白说出来。

很多年后，我问我母亲那天她把信件交给我时，她心里有什么期望。“没什么特别的，”她说，“我不想你以后才找到它们。我希望你能亲手从我这里拿到这些信，得到我的祝福。这样的话，我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告诉你你想怎么处理它们都可以。这就是我把它给你的原因。”

我并非第一个在父母痛苦的回忆后面追寻隐藏的真相的孩子；也不是第一个不得已感到过去长长的阴影是如何影响我自己的身份和信仰的——这可以给我稍许安慰。这对我们两人而言都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虽然执笔的人是我。这些信让我们懂得了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教会了我们友谊和笑声的力量，以及在最不寻常的条件下，生命和爱的执着。

这，便是我母亲的故事。

